

谈谈高校文科学报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杨 小 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进入了建国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不仅数量越来越大,而且质量越来越高,成为我国学术理论战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无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还是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它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据有关统计,全国3204家社会科学期刊中,高校文科学报有400多家,约占全国社会科学期刊的12.5%,而全国55%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就发表在这只占全国社会科学期刊总数12.5%的高校文科学报上。应当说,高校文科学报在我国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文化的发展乃至理论队伍的建设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但是,如何进一步办好高校文科学报,高校文科学报本身究竟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规律,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几年来,我们学报界的同仁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在讨论中,发表了不少很好的见解,这对问题的解决和整个学报改革的深入都是大有益处的。为了向学报同仁们学习,共同探讨和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就高校文科学报的几个关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于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

原教育部在有关学报工作的几个文件中都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刊物。”这是对高校文科学报性质和特点的一个明确规定。这一规定既揭示了各高校文科学报的共性,又指明了高校文科学报区别于其它期刊的特性。无论是共性,还是特性,首先集中表现为它们的学术性。学报学报,顾名思义,它首先应当姓学,离开了学术性,就没有学报存在的价值。我国高等学校学报从初创时期起就把学术性作为办刊的根本宗旨。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工作时在为《北京大学月刊》(即北京大学学报前身)撰写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并反复申述:“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可见,北京大学之所以要创办月刊,就是为了便于刊登“长篇学说”,荟萃“各方之意见”和“研究之新义”,一句话,就是为了繁荣学术。这就充分体现了学报要强调学术性这一根本宗旨。初创的《清华学报》也规定,“本报以研究学问为宗旨,选载研究学问之文字”。《燕京学报》提出:“以发表研究中国学术著作”为主旨。1930年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创办《文哲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理科季刊》(武汉大学学报前身)时亲自撰写“创刊弁言”,也反复强调刊物的学术性这个特点,要求把这些刊物办成“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促进“高深学术”之发展。

把学术性作为高校文科学报的第一特性,看来是从我国第一批高校学报诞生之日起就定下了的宗旨,时至今日学界对此也未曾有过异议。所不同的是对学术性的涵义的理解比之过去更要深刻得多了。比如有的提出,“学术论文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以说明必然为已任的”,有的则把学术概括为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具有理论性、规律性的“学问”,有的还试图对学术性加以科学的界定,认为科学性、稳态性、系统性、开放性、争鸣性五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协同配合而构成学术性的本质特征。以上诸说,见仁见智,都是很有益的探讨。不过,笔者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还不完全在于对学术性这个特点作如何科学的界定(当然这也是必要的),而在于对学术性与现实性两者关系的正确把握。现在的问题往往出在这里,影响我们对学术性的正确理解和坚持。过去有两种倾向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一个是离开学报学术性这个特点去赶形势,跟风头,这在“四人帮”肆虐时期最为突出,当时的学报发表的文章几乎大都等同于大字报,而学报本身也差不多办成了大批判专栏,教训是相当深刻的。一个是片面强调学报的学术性而对现实保持距离,一味追求“大洋古”,重史轻论,怕联系实际。实践证明,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利于学报工作的健康向上,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深入发展的。之所以产生这两种倾向,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不能完全责备广大学报工作者。但是也要看到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我们学报工作者认识上的偏颇,没有紧紧把握住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正确关系。其实,学术性与现实性,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有机统一体。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凡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总是这样那样地同现实相联系的,都有不同程度的现实性。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学术活动的出现,每一种学术观点的形成和发展,都可以找到它们的现实的政治背景。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就是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为前提,并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务的,是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的土壤并和当时的现实紧密相联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浩繁的学术巨著的创作活动更是深深地打上了当时现实生活的烙印。司马光明确地说《资治通鉴》是为皇帝作借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以为学术可以完全离开现实,那只是欺人,或者是自欺。当然,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说,凡是现实性的,都是学术性的,因为毕竟现实只为学术提供了存在的前提和内容的基础,究竟有无学术性,或者说,学术性究竟有多大,还得依靠广大学术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针对现实提出来的问题去研究、思考、提炼、发现,还得进行长期的、认真的、艰苦细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改造制作功夫。

高校文科学报,作为学术理论刊物,它所发表的论文,既然应当要求学术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那么,在组织、编审稿件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以下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要强调学术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现实服务。既然在前面我们说过,凡是学术性的,都是现实性的,那为什么在提出学术性的时候,要强调学术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呢?不错,凡是学术性的,都是现实性的。但是,对于不同的学术问题来说,其现实性虽无有无之分,却有强与弱、大与小、直接与间接之别。我们强调学术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现实服务,就是强调学术研究首先应当要有强的、大的、直接的现实性。应当强调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的命运从来都是看其满足时代需要的程度来决定。“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①我们应当看到,今天,中国十亿人民正在从事现代化的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呼唤着伟大的理论,人们有理由要求我们广大的学术理论工作者投身到丰富而又生动的实践中去进

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及时而又完满地向人民奉献出既有高度的学术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并能直接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现实服务的学术理论的珍品来，这是其一。其二，时至今日，广大的学术理论工作者虽然都开始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方面来了。但是，必须指出，确有一些学术理论工作者，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一段时间内对现实性问题的研究兴趣不浓，热情不高，总想与现实性问题保持距离，一味追求“大洋古”，企图在“大洋古”中寻求“政治保险”，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现实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以期能及时地克服这种不应有的倾向。其三，之所以在强调学术性的同时，必须十分注意现实性，还因为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一刻也不能离开对现实性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深入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诸如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在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初级阶段的观点，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要条件的观点等等，都是由于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结果，都是对改革与建设这个伟大的现实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的产物。如果我们不深入实际，不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发挥和发展这些科学理论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问题仍然是理论大大落后于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现实，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大力提倡对现实性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深入研究。

第二，在强调现实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术性，把学术理论研究和政治理论宣传明确区别开来。学术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并不等于把学术理论研究和政治理论宣传完全等同起来。学报，作为学术理论刊物，与一般的政治理论宣传刊物还是应当有所分工、有所区别的。学报当然应当对重大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对党的决议、政策进行宣传和论证，但在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却不能完全停留在这种一般的宣传、解释和论证上，而要从理论的高度从事科学的研究。对于党的决议和理论，我们既要看到它是科学研究的产物，又要明确它还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应当而且可以用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来帮助党形成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决议和理论；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对党的决议和理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再进行再研究，这种再研究的成果又可以使党的决议和理论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起来，或者帮助党在新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新的决议和理论。当然，要实现这样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要求自己。

对党的决议和理论应该有这种科学的态度，对其它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更需要有这种科学的态度。决不能对现实提出的问题作简单的类比和图解，更不能从现实中抓住一两条材料，急于求成地提出一种看法，形成一种观点。这样作是不能叫做学术研究的，是缺乏学术性的，是没有学术价值的。如果一篇学术理论文章，它没有建立在一种系统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理论性，那就不能轻易在学报上为之放行；如果确实建立在一种系统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不仅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和理论性，而且提出了新问题，发现了新材料，做出了新论证，形成了新观点，那这样的文章就最有学术性，最有学术价值，是应当在学报上大力加以提倡的。

第三，我们强调学术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种统一和联系的道路应当是广阔的，决不能把它理解得过于偏狭。学术理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服务，有着丰富的、多方面的内容。这里包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过程各个方面发展规律的研究和探索，也包括从理论上回答广大干部、群众、青年从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实践

中提出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也包括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论述的,强调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决不是说,凡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一些距离建设和改革比较远、不那么直接的学科,诸如训诂、考古、古籍整理等等,也应当组织一部分学术力量去认真进行研究,这些学科尽管看起来似乎离现实很远,不那么直接,但它们却是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息息相关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所有这些学科都是社会主义学术理论交响乐曲中的不可或缺的乐段或旋律,但又决不是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务必要加以明确的。

关于学科的统一性与综合性的关系问题

1842年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指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内在的规律。”^②高校文科学报自己内在的规律即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上面所说的学术性呢?是的,学术性是高校文科学报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仅此还不够全面。既然这个学报是高校的,而每一所高校都设置有多种专业、多门学科,不仅有传统的文、史、哲、经、图、教,还有不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其中有些学科又是社会上绝无而高校仅有的。这众多的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显示出学科的统一性;这些单一的学科的研究成果又都要求作为高校学术窗口的学报按一定的比例予以反映和报道,从而呈现出学报的综合性。所以高校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报反映的综合性便成了高校文科学报的又一特点,而正确处理好学科的统一性和综合性的关系正是提高高校文科学报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

通观现在的高校文科学报,不少都是习惯于按学科的统一性来组编稿件,比如按文、史、哲、经、图、教……诸学科的一定比例组编,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拼盘模式。这行不行呢?不能说就一定不行。因为这种拼盘模式,尽管简单化了一点,但毕竟还是体现了学科的统一性与综合性的统一,仍不失为一种组编稿件的有效传统方式。当然,这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往往容易为懒人敞开方便之门,形成一种来什么文章发什么稿的被动消极局面,不利于发挥编辑的创造性,也不利于体现编辑在组编稿件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于是有些同志提出了要打破大拼盘格局的设想,有的主张分专科出版,这一期出文学版,那一期出哲学版;有的主张出专辑,使各学科分割的地盘形成一个个小中心;也有的主张按中心思想分学科组稿,既有各个学科的统一性,又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些设想应当说都是在坚持改革,提高质量前提下的有益的探索。不过,笔者认为,分专科出版,固然打破了拼盘格局,但是却失掉了学报综合性的特点,这与专科性学术刊物比如文学评论、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存在什么区别呢?如果所有的学报都办成专版,岂不无异于出版社的“丛书”、“文集”,又怎样维护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呢?不管怎样,学报的综合性是不能否认的,否认掉综合性,就等于否认了学报本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至于按一定的中心分学科组编稿件,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比如围绕文化问题这个中心,从文、史、哲、经各个学科进行研究,既有一个中心,又有各个学科,探讨问题比较深入,反映成果也比较集中,应当说,社会效果是好的,但我仍然认为,这还是一种综合性,是围绕一个中心来进行“综合”,或者说,综合起来,突出一个中心,这叫做万变不离其“综”。这种综合办法好固然是好,但是这个中心难找,特别是学科

覆盖面广的中心更难找。就拿文化问题这个中心来说,尽管是比较理想的,但仍不能覆盖文科所有的学科。如果我们孤立地静止而又长期地使用这种办法,那也未免显得过于单调,出现新的僵化格局。而况,这种办法再好,也只是百花丛中的一朵,哪怕是朵大红花。其它另外一些综合性的方式,还有待于我们去努力创造,而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传统有效的一些组编方式包括拼盘模式也并不见得一定要不得,一定用不得。只要是真动了脑子,有思想,真正把学科的单一性和综合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就应当算是摸到了一点规律。

如何把学科的单一性和综合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下几点似乎是应当考虑的。

首先,要有整体的编辑思想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的简单总和。从具体的每期学报来说,一篇篇文章,哪怕是好文章,加起来的效应并不等于整体效应,整体效应常常大于个体效应的总和。这样,整体效应就成为更能集中反映学报的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作为一个编辑,为了确保学报质量的不断提高,就一定要讲究整体效应,就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整体的编辑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编辑,他们习惯满足于当文稿的收发,常常是勤勤恳恳的,照收照转,来什么文章发什么稿,结果把自己的学报办得没有起色,没有反响。这样的编辑越多,刊物的质量越难提高,千刊一面,全无特色的局面自然在所难免。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足为训的。究其原因,关键还在于对整体效应的重要性的认识,缺乏一个明确的整体的编辑思想。

所谓整体的编辑思想,就是系统论的思想,就是编辑的主体思想。这是办好学报的灵魂,也是把学科的单一性和综合性有机结合起来的金钥匙。有了这个整体的编辑思想,我们就不会再是被动消极地去反映,搞乱杂无章的拼凑,而是要按照一定的主体思想,按照一定的编辑意图,有目的、有计划、有秩序地去组织稿件,编审稿件,紧紧抓住学科领域中的难点、热点、光点、生长点和结合点作文章,从整体上明确什么是红花,什么是绿叶,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为中心服务的,明确如何形成这个中心,如何体现这个中心,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个中心的整体效应。

第二,要有开放的编辑意识 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的学术也应当是开放的学术。作为以提高为主的并且又以在较深层次上以较高的要求去追踪学术研究的新发展为已任的高校文科学报的编辑,应当具有开放的编辑意识,这是毫无疑义的。

所谓开放的编辑意识,从实践的需要来考虑,似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纵的方面把握包括传统学科在内的各个学科的发展趋势,不要用僵化的静止的封闭的观点对待每一个学科乃至每一个学派。因为世界在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文明在突飞猛进,社会实践向学术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要求从理论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并且进行新的学术概括。一是从横的方面加强各个学科、各个学派的联系。当代科学的发展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各学科互相渗透,横向贯通的趋势,传统学科的分界也因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不断萌生而逐渐显得模糊不清。因此,不应囿于传统学科的分界,而要自觉地超越这种分界,促进各学科的横向沟通。三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敞开学术窗口,在高校文科学报上及时地引进和介绍国外新的学术思潮、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乃至学术资料,以此开拓学术视野,活跃学术空气。

第三,要有求异的编辑思维 对于编辑工作来说,所谓求异思维,就是在求同的基础上,着意求不同,寻找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特点,从而提出既有异于过去、有异于别人,又有异于自己的现在的见解和观点,创造出新成果,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

前。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上面谈到的整体的编辑思想、开放的编辑意识之外,还要具有求异的编辑思维。

求异的编辑思维,首先表现在制订选题计划的过程之中。制订选题计划不能搞几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要考虑时代的变化,在变化中求发展,使选题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或者超前,既要有整理优秀文化遗产的选题,在整理中有新发现,新见解;又要有反映时代精神的新著述和新创作的选题,在反映中推陈出新,标新立异;还要思考多种学科的新发展,使选题适应学术研究、基础理论等多方面的新需求。在这样的思考设计中,追求选题的“优化”和“深化”,这样,就会有所突破,出现与别刊不同的新选题,创造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和“传世之作”了。

求异的编辑思维还表现在审稿过程之中。一方面,要善于在比较中认识稿件的不同于别人的新观点、新材料或者新方法,加以综合性的集中;一方面又要坚持“唯陈言之务去”,对于夹杂在文稿中的那些套话、空话、假话、大话应尽量删去,或劝其删去。作为编辑,必须努力寻求本刊与他刊之异,本文与他文之异,自身与他人之异,这样才能保证出新意。

求异的编辑思维也表现在组版过程之中。作为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刊物,在组版中,要善于博采众家之长,而这个众家之长就是不同于自家之异,无所谓异,就无所谓长。在各个单科学科中采得众家之长之后,在整体的编辑思想的指导下组编成一本刊物,这样这本刊物就形成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大花园,这是我们编辑应当追求的理想目标。

关于学报的内向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学术性、综合性固然是高校文科学报的重要特点,但是光是学术性、综合性还不足以和社会上的学术理论刊物区别开来。因为,社会上的学术理论刊物也是有以学术性、综合性为自己的固有特点的,只有把学术性、综合性和内向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足以显示出高校文科学报的应有特色,也才足以和社会上的学术理论刊物明确地划清界线。所以,原教育部的文件在阐明学报的性质时,在“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刊物”之前,冠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定语,这是很有道理的。

学报是高校的学报,强调其内向性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不容置疑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内向性似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学科内容的内向性,即学报应以反映本校学科的内容为主;一是用稿的内向性,即学报应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

当然,我们强调内向性,并不是主张关门办报,不向社会发行,不要社会承认,不讲社会效益。学校不是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学报也不是离开社会的神秘的禁果,它与社会的脉搏是紧紧相连的。一句话,高校文科学报除了有其内向性之外,还有其社会性的一面。一本学报出版了,社会上什么反映也没有,无声无息,无益无用,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办学报,立足学校是基础,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是目的。所以我们还要讲社会性,讲社会效益,而大家习惯所说的引用率、摘登率、转载率等就是社会效益的具体表现。

内向性重要,社会性重要,把内向性和社会性有机统一起来更重要。要实现这个有机的统一,下面几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从本校实际出发,反映本校学科的优势和特色 各个高等学校各不相同,各自有着各自的学科优势和特色,我们的学报就应当首先从自己的学校实际出发,适应自己学校的性质和学科的发展趋势,不能离开学校的任务去另搞一套,而要与自己学校的性质、任务相

协调,同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同步发展。这是内向性的第一个含义所要求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报在组编稿件时要注意并且体现自己学校的学科优势和特色,而不能丢掉这个优势和特色,甚至到社会上去拉一些其它的与自己学校的任务、性质不相协调的学科的稿件。从内向性的第二个含义出发,学报所发稿件应绝大部分是内稿,是本校师生员工的稿件。这是学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促进和推动学校教学和科研深入发展以及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所要求的。前面说过,一家学报出版了,社会上什么反响也没有,并不是什么好事;但如果为了引起社会反响,到处拉外稿,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从根本上离开了学报的办刊方针和宗旨,离开了学报的根本任务。

第二,要慎重对待外稿 学报既然还具有社会性,完全不用外稿也是不现实的,不妥当的。关键在于要准确地把握内稿和外稿的采用原则和比例。一般来说,外稿控制在十分之一以内是比较合适的。太多了,恐有喧宾夺主之嫌。至于采用原则,各校有各校的具体情况,很难强求一律。有的提出以下几条,是可行的:(1)参加本校主持和组织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有关有质量的学术论文;(2)为了填补本校学术研究空白,有目的有计划地约请校外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学术论文;(3)对本校学报发表的论文提出的有分量有水平的商讨性的学术论文和针对本校学者、专家出版的学术专著撰写的书评;(4)本校校友的有关的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当然,这样几条不一定就很完善,但其目的还是为了促进本校教学、科研的深入发展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三,根本问题在于不断提高学报质量,讲究社会效益 不论是采用内稿,还是外稿,都要围绕提高学报质量、讲究社会效益这个中心,质量和效益是统一的。

提高质量、讲究效益,一定要坚持创造性。学报所发表的论文不能是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而应当具有一定的创造价值。学报所提供的新成果、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应当或迟或早地能为社会所应用,发挥其作为思想库的作用;或者能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或者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论证,或者为各项社会服务提供咨询,或者为一切创造发明提供思想。我们的学报如果在上述四个方面,都能很好地实现,那么,就完成可以说,我们的学报是有社会效益的,是有很高的社会效益的。

最近几年,武汉大学的专家学者为武汉市的改革和建设提出过不少好的咨询和建议,他们受到有关方面的采纳,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关于“两通起飞”的咨询,关于“招标投标”的咨询以及“目标成本控制法”等等,而这些咨询和成果,都曾经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对这些咨询和成果,武汉市领导十分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对武汉大学的专家、学者提出表扬。原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同志就说过:“过去说一字值千金,现在是一计抵万金。”

十分清楚,我们强调作为学报重要特点的内向性,并不是为内向性而内向性,搞关门办报,而是为了社会性,为了社会效益而讲内向性,就是说要通过学报把自己学校社会科学方面最新、最高、最优的科研成果贡献给社会,为社会服务,为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服务。

(本文系为1988年11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主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9页。